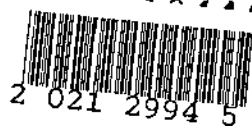


统战工作史料

选 辑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5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第五辑

(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五)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一月

责任编辑 李定铎
封面装帧 范一辛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第五辑

(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五)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5 插页 1 字数 141,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

书号 11074·003 定价 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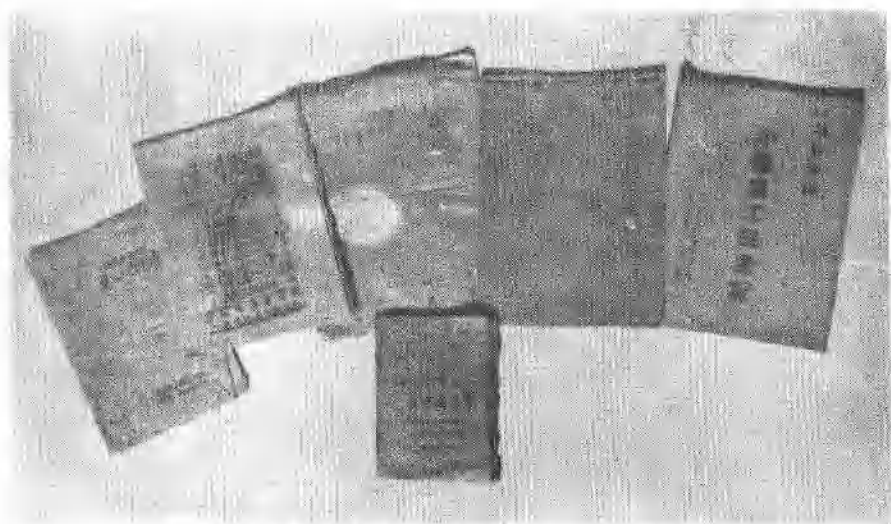
周恩来和朱学范在重庆(一九四五年)



邓发(左二)、朱学范(中)等出席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时留影(一九四五年十月)



张元济(中)九十寿辰时,观宣纸裁市长赠的寿礼(一九五六年九月)



解放战争时期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印发的部分宣传品

目 录

党引我走向革命	李国豪(1)
回顾“银联”	张承宗(10)
党的关怀暖侨心	董寅初(16)
侨务工作点滴回忆	张持平(20)
苏南敌后的统战工作	范征夫(26)
记南通学院迁入抗日根据地	舒 析遗著(48)
张元济两次晋见毛主席和书信来往	张树年(56)
八一三抗战时郭沫若在奉贤	张明楚 姚金祥(61)
王绍鏊革命生涯	许士汇(65)
从民族工商业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记胡咏骐同志	林震峰(72)
我们所知道的张锡昌同志	薛葆鼎 邢若均(76)
回忆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教诲	姜庆湘(87)
上海解放前后我所参加的社会活动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日记摘抄	李文杰(96)
敌后工作片断回忆	唐公福(111)
党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劳动协会	陆象贤(118)

解放战争时期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活动概略

- 许士林 夏高阳(127)
-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上海分会情况杨修范(140)
- 我所了解的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沈祖戴(146)
- “孤岛”时期的上海“银联”话剧组
- 王季深 沈希瑞 祝纪和 吴洪年(153)
- 五金界同人联谊会建立前后沈孝锟(162)

学习《共同纲领》，统一思想认识

- 记陈毅、潘汉年同志作学习辅导报告.....黄松岗(172)
-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自己命运.....孙丕晋(182)
- 学习时事政策，迎接合营高潮.....王冠群(188)
- 系统学习理论，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林 晓(193)
- 上海市政协举办业余政治大学概况任竹如(198)

党引我走向革命

李 国 豪

我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清寒，勉强支撑我进了中学念书。在中学时，我虽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参加了一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但主要是专心读书。十六岁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更加勤奋学习，希望学有所成，以后报国为民。谁知我大学毕业后，迎面来的却是失业。但我还是希望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也许科学可以救国的吧！

一九三八年，我的一位好心的老师，为我争取到了为期一年的洪堡奖学金。于是，我设法拼凑了一笔旅费，自广州出境，到德国达城工业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在那里，我靠着菲薄的奖学金，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以一股拼劲儿，进行着科学研究，取得了成果。我写了博士论文，发表后受到德国桥梁工程界的好评，获得了“工学博士”。后来又连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并获得“特许任教博士”学位。这时，我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我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眺望东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一九四六年，我带着内人和婴儿，抱着建设祖国的心愿，辗转半年，回国到了上海。作为在异国他乡苦度了八年的游子，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心想：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的工业将会振兴起来；我专攻的桥梁工程专业，也该有用武之地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国统区仍是民不聊生。我留学八年回来竟找不到职业，靠领取救济金度日。

这年六月的一天，我和另外一位留德同学领完救济款，偶然间发现一扇门旁挂着“工务局”的招牌，便抱着侥幸的心情进去毛遂自荐。当时的工务局长赵祖康先生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的处境十分同情，立即接纳我们进局工作。从此，我才有了糊口的差事。我一家三口和一对留德回国夫妇搬进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工务局宿舍。可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哪有什么建设可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仅仅搞了外白渡桥的修理工程。生活迫使我到刚从四川搬回上海的同济大学兼职。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我国的知识分子难得有用武之地。

由于我在修理外白渡桥时，提出了一不封锁桥上交通，二不新筑桥台的简便施工方案，康益工程洋行的丹麦人老板很欣赏，以高薪聘我为工程师。我原以为可以借此施展自己的抱负，可是，事与愿违，在外国洋行里，尽管你是工程师，技术在洋人之上，职务却只能在洋人之下。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毅然辞去了洋行的工作，完全回到同济大学专职任教，从此，专心致志于教育工作。

然而，在这高等学府里，我看到的是国民党爪牙横行霸道、摧残青年的种种暴行；不少富有正义感的有才华的青年学生频遭迫害。而我自己为生活四处奔波，弄得精疲力尽，全家人还是无法摆脱凄风苦雨的境遇。科学无从救国，甚至教育难以谋生。出路在哪里呢？严酷的现实促使我不得不从政治上寻找原因，对于革命群众运动和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给予关注和支持。

一九四七年初，同济大学新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在地下党的领

导下，积极带领全校同学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设法为广大同学服务。学生自治会在同济大学工学院办了一个阅览室，陈列有《反杜林论》、《西行漫记》等书籍，还有《文汇报》、《新民晚报》、《时代》、《周报》以及反映各地学生运动的快报。学生自治会还办了一个服务部，一方面为同学们服务，另一方面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各项政治活动（如文艺晚会和游行示威宣传品的开支等）。服务部还秘密出售进步的学生刊物，如浙江学联的《求是》和《复旦新闻》等。同时，服务部也是学生自治会的联络点。因此，服务部成了学校三青团的眼中钉。三青团在工学院大门外办了一个“济友小食部”，同学生服务部唱对台戏。我支持进步同学的服务部，并以工学院院长名义撤消了“济友小食部”。

当时，国民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扩大内战，一些官僚政客飞扬跋扈，残害百姓，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学生运动不断兴起。同济大学学生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举行罢课。我支持他们这一行动。同济学生自治会在罢课期间，派代表访问了我。我鼓励他们说：“学生运动需有决心和毅力。一切归咎于内战。内战一天不停，中国没有前途。”当时，我所在的工学院已成了同济大学学生活动的中心，学生经常在工学院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演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广泛群众性的节目，如秧歌舞《兄妹开荒》和《光明赞》等，以此来提高大家的认识，团结广大同学。由于学运不断，国民党政府一方面直接派人镇压，另一方面又命令校方成批地处分和开除学生。我利用土木系主任、工学院院长职务，为这些学生辩护，并时常向进步学生组织通报有关情况。当时，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是国民党市党部书记的亲属，我就把这一情况及时告诉学生自治会代理理事长、地下党员杜受百同志，要

他提高警惕。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同济大学的爱国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帜，举行了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这就是著名的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之后，国民党教育部又命令校方开除学生。有的教师不明事实真相，错怪学生。我及时在这部分教师面前为进步学生说话，我说：“我住在学校里，知道学生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如果我是学生，也同样会不满的！”设法争取更多的教师支持进步学生。

为了鼓舞斗志，团结群众，同济大学地下党组织决定为被开除的一批地下党员和学运积极分子举行一次“惜别晚会”。校方出布告不准召开，并派人剪断礼堂的电灯线。学生们对校方的布告置之不理，他们找来两盏汽灯，照常开会。我支持他们，并出席了“惜别晚会”。这样，学生们也就越来越把我当成自己人。有一位杜臣梁同学，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受到迫害，不得已在夜间秘密离校，临走之前，他还登门与我告辞。电机系的阳经纬同学，是同济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因领导学生运动和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成绩落后了，学校故意取消他的助学金，使他经济上发生了困难，他便毫不见外的来找我要求帮助。地下党人和进步学生对我的信赖，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为了向群众宣传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地下党又领导学生创办了《同济人》报。我为该报捐了款。

一九四八年初秋的一天，我中学和大学时的余森文老师来找我，说带我去见一个进步朋友，我欣然同往。路上，余老师向我介绍了这个人的情况，他叫陈向平，是一位地下党员，这次受党的委托，特来与我联系，并拟在适当时间接收我加入党的组织。我们很

快来到了溧阳路《东南日报》社，见到了陈向平同志。我们细叙着现时和未来。我们紧紧握手告别时，真是一见如故，相识恨晚。陈向平同志高兴地说：“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党希望你帮助做好护校应变工作，争取全部爱国教师安心留在上海，不要到台湾去，大家团结一起建设新中国。”自此之后，我和陈向平同志保持联系，他给我送来了共产党的有关刊物，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党，并从党组织那里接受了新的思想，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一九四九年初，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研究决定，重新恢复被反动校方扼杀了的学生自治会，并于三月二十一日举行学生自治会正式复会庆祝大会。我作为同济教授会的代表参加了庆祝大会，并和郭绍虞教授（当时任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起，向大会献了锦旗。锦旗上绣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寓意深刻的唐诗。

此后，进步学生组织便着手进行护校应变的工作，特别是加强思想发动和教育。学生福利会和壁报联合会针对“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谬论，在工学院组织了大型专题辩论会，揭露南京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实质。我支持这些活动，并领导工学院所属各系、图书馆和机械厂，将图书设备装箱，做好应变准备工作。同时，根据陈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反复做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夏坚白教授的工作，和他谈心，要他和广大爱国教师一起留下来，共建新中国，共办新教育。起初，他对党的政策不大了解，有些顾虑。经过党组织多方面的关怀以及同事的帮助，终于使他看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和广大爱国教师一起留在上海，参加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建设。

由于我多次在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支持进步学生，引起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被他们列入黑名单，标名为“红色教授”。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陈大庆、毛森等人调动了一万多名军警特务，疯狂进行大逮捕。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辆“飞行堡垒”冲进了同济大学工学院教师宿舍区，军警按照黑名单到处抓人，也准备抓我。由于特务不认识我，又搞错了我的宿舍地址，闯进了另一位教授家里，问那教授：你是李教授吗？恰巧，这位教授也姓李。于是，军警连推带拉误把这位李教授抓走了。我才幸免受迫害。这天晚上，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陈太顺和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夏正行等正在开会，来不及转移，躲在工学院我的土木系办公室天花板内，也幸而脱险。国民党的卑劣行径，促使我更加坚定了和进步学生共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四·二六”大逮捕后，工学院许多进步学生在校内安身有困难，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地下党组织委托我的一位学生、地下党员来找我，要我设法协助。我们随即一起冒着大雨找到同济的一位校友，将进步学生设法隐蔽在一个厂房里，直到上海解放。在大逮捕的第二天，我也搬到了市里，立即和陈向平同志通了电话，告诉他我很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请他放心，并告诉他住址，以便联系。

国民党在大逮捕之后，紧接着搞大破坏。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发出命令，限定全市十五所大中学校在四月三十日前腾出校舍，供驻军使用。二十八日，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同济大学工学院，限令于当天下午三时前迁出。由于我对图书资料和其它财物的搬迁，事前作了妥善安排，一支由进步师生、职工组成的数百人的纠察队和运输保管队伍，很快就把所有的重要校产及行李迁移集中到常熟路医学院，粉碎了反动派的破坏阴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新中国诞生了，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美蒋飞机轰炸上海，给上海人民带来了灾难。我当时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也有些担心。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了，陈毅市长在会上分析了困难的暂时性，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使出席会议的代表受到很大鼓舞。我在会上亲睹党和政府领导人员为人民服务的真诚和热情，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劲头，比之国民党不管人民死活、有难先逃、有财先抢的情形，真象白天和黑夜一样分明，使我感慨万千，同时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它的民主作风。

这年春天，为了落实同济大学迁往东北的打算，我率领学校的代表团去东北访问，亲见了解放后的东北政治上和人民生活上的一派新气象。其间在大连经历的一件事情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到大连的次日，大连市速成中学校长根据大连市委的决定，亲自引导我们参观拟让给同济大学使用的速成中学校舍，并建议我们如何使用，如何扩充。这种上下一致、舍己为人的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上下闹意气，左右争名利，学校搞宗派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别。这不但给了我深的教育，同时使我再一次具体地看到了党的坚强的组织力量。

一九五一年，我开始在党组织举办的党课教育中，阅读关于党和党员修养的书籍，使我不但从事实上，而且也从理论上逐渐认识党的性质。后来通过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发展的事实中受到启发教育，使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党是建

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为奋斗目标的政党。同时，我进一步了解到，共产党员应该具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高尚品质，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有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崇高志愿。

一九五二年春天，全国开展了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参加“华东高等教育界学习会议”，我深切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党对坏人坏事进行毫不容情的坚决斗争，严肃处理了大贪污犯、党员负责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等，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我肃然起敬。特别是党对于我被诬陷贪污一案的处理，更加深了我对党的热爱。“三反”运动中，我被人诬陷，被当作“大老虎”隔离审查了两个多月。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鉴于历史上的冤案事例，非常担心我的冤案何年何月才能搞清。但在被隔离的第二天，我就在报上读到《矛盾论》，认识到共产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理论指导的。我便逐渐放下心来。后来在被隔离期间，我还有幸比较深入地阅读了联共党史和毛泽东同志的整风文献、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等书籍，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抗美援朝的黄继光、邱少云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也给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深深认识到：为了坚持真理，有时要付出代价，而为了清除腐败，建设国家，我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我相信最终会水落石出。我的胸怀也就开阔起来。后来，党组织召开全校大会，为我澄清了事实。在解除隔离的第二天，我就去哈尔滨参加教育改革讨论会。经过这次运动，我比以往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党真正代表人类的真理和光明。我感到，为了更好地追求真理，为了

人类的光明和幸福，自己不仅有责任爱护党，还应该加入党的组织。所以，我在一九五三年二月正式提出了入党的申请。经过党的考验，我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 顾 “银 联”

张 承 宗

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银联”)创建于半个世纪以前。当年是新事新闻,现在已成为历史。

“银联”的成立,在三十年代中期来说,是一个创造;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是银钱业群众的创造,成为广泛组织职员群众的新经验,曾经得到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表扬,在抗战初期予以推广。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不愿做亡国奴,成为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呼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正确,合乎国情民情,深得人民的拥护,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青年首举义旗,随即掀起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的高潮。

当时参加职业界救国会第四大队的,主要是银钱业职业青年(约有七八十人),其中有些人参加过党领导的武装自卫会和左联等团体。大队长张人俊,中队长袁君实、杨志发和王心明,都是银行界职员。他们在救国会的实践中,深切感到抗日救亡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才能实现民族的解放。一九三六年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前后,救国会开展游行示威和革命纪念活动很多,尤以五月最为频繁。大